

历史的政治意蕴:约翰·罗伯特·西利史学思想述论

刘耀辉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约翰·罗伯特·西利是19世纪后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历史学专业化的重要倡导者和推进者。西利反对以麦考莱为代表的文学性历史写作,提倡科学的历史学。同时,西利相信历史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强调历史研究即为政治研究,宣称历史是一门关于国家的科学,历史也是培养政治家才能的学校。西利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其对英国扩张的探讨,不仅回应了其时英帝国面临的问题,也对英国人的帝国情感和后来帝国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约翰·罗伯特·西利;科学的历史学;麦考莱;政治家才能;英帝国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6-0093-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610

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 1834—1895)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讲席教授(1869—1895),19世纪晚期英国历史学改革的主要推行者,英国历史学科专业化的核心人物之一。西利的主要著作包括《看这个人:关于耶稣基督生平与业绩的考察》《斯坦因的生平及其时代,或拿破仑时代的德国和普鲁士》《英格兰的扩张》《英国政策的发展》等,以及其他一些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文章。西方学者就西利的生平与著述、历史观和英帝国史书写做了较多探究:费希尔(Herbert A. L. Fisher)在《约翰·罗伯特·西利》(1896)一文中,较早对西利的主要作品和成就做了评价。德国学者赖因(Gustav Adolf Rein)的《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爵士研究》(1912)一书讨论了作为历史学家与政治家的西利。彼得·伯勒斯(Peter Burroughs)的文章《约翰·罗伯特·西利与英帝国史》(1973)探讨了西利对英帝国史书写的影响。德博拉·沃梅尔(Deborah Wormell)的《约翰·西利爵士和历史的用途》(1980)对西利的生平和成就做了综合性考察。此外,一些讨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史学史的著作也涉及西利的史学思想。就国内学界而言,近几年出现了少量专题论文。施华辉在其发表的系列文章中对西利的帝国史书写与历史教育思想做了较透彻的分析,吴征宇与陈小屋从政治学视角探究《英格兰的扩张》一书,强调西利的历史政治观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总体而言,西利的历史观仍有待全面梳理和深入讨论。因此,我们拟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西利的一些重要作品来分析其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并评价西利在英国历史学发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收稿日期:2024-09-18

作者简介:刘耀辉,男,历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国史、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教授群体研究”(2020YBLS17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比较视野下19世纪牛津和剑桥历史学派研究”(22SKGH080)。

一、西利与科学的历史学

19世纪中后期是英国历史学科专业化的关键时期,在德国兰克史学观念的影响下,牛津和剑桥一批历史学者开始提倡科学的历史学,此前的文学性历史书写遭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评。就当时英国而言,历史学规范的主要倡导者是约翰·西利和爱德华·奥古斯塔斯·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等人,他们通过严厉的批评——尤其针对那些宣称历史学家是艺术家的人——为科学的历史学家建立了一种标准的身份^[1]⁷⁴。西利长期担任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教授席位,他在一系列演讲和作品中宣扬历史的科学性,也多次对具有文学特征的浪漫主义史学及其代表人物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予以言辞激烈的批评。

(一)历史有别于文学

西利指出,尽管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科目,但是,两千年来,它都被置于文学名下,而史学家通常也被拿来与诗人作比较,人们赞美他们是出于相同的原因:文笔流畅、富于想象、庄严崇高、感染力强等。当然,史学家也具备一些科学素养,例如准确性、不偏不倚等。不过,这些品质似乎难以为他们的名声增光添彩,因为他们的声望主要取决于受欢迎度而不是科学性。在公众眼中,历史学家就是文人,是能够以丰富而迷人的风格叙述过往美好事物的作家^[2]。

在西利看来,历史与文学有明显区别。他对处理历史的两种方法——文学性和科学性方法——产生的实际影响做了探讨。一般而言,文学性史学被认为是浪漫的,只关心遥远时代,而文学性史学家为了著作的销量,往往选择浪漫的主题,并且以诗意的语言来装扮它们。这类史学家把历史视为“无数传记的精华”,他们也会收集事实,但是这么做的目的不在于从中找到一般性命题,而是为了通过它们创造一种迷人的效果。他们并不认为可以经由历史发现任何新的、重要的真理体系,在他们眼中,历史永远都无法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西利指出,这个学派的偶像是塔西佗。不过,他认为塔西佗的叙述并非完全可靠,因此现在不应当效仿这位古罗马史学家^[2]。

(二)批评浪漫主义史家

西利发现,英国一些作家致力于让历史变得通俗易懂,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和麦考莱就是重要代表人物。司各特及其效仿者讲述的历史故事,让一些很可能无人问津的历史时期变得为人所知。而且司各特的作品让历史作家和读者意识到,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与我们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西利认识到,麦考莱深受司各特的影响,因为“根据麦考莱的原则,历史可以写得像浪漫小说一样趣味横生,它迫切需要一个富有趣味的情节……人物形象鲜明,对比巧妙,叙事流畅,让最棘手的立法和金融问题像ABC一样简单,最重要的是,要有数量合理的趣闻轶事。它无须担心历史的真相可能不承认这一切……”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无聊的家伙,缺乏麦考莱的神笔”^[3]。不过,西利认为,从本质上而言,这种文学魔力是“诗人或吟游歌者的天赋,当被应用于历史事实时,它自然会把它们变成虚构的故事”^[3]。对西利而言,这显然与历史的本质相悖。

西利批评司各特和麦考莱,认为他们的著作造成了一种难以修复的伤害,不但败坏了公众趣味,也误导了历史作家。由于他们的作品广泛流行,深入人心,从而带给人们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他们的写作方式就是“书写历史的正确方式”,误以为最优秀的著作就是可读性最强的作品。而许多历史教师在讲授历史时,也认为只需要挑选那些能够打动人心、吸引眼球的内容^[3]。不过,西利笔下的历史呈现出另一种景象。

西利否认麦考莱开辟了一条通往历史知识的捷径,因为它并不存在。西利宣称:“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清楚地知道历史是由哪些重要事物构成:议会法案、预算和税收、货币、错综复杂的立法和行政细节,

简而言之……世界上最令人厌烦的主题。”然而,浪漫派史学不会让读者受到枯燥的统计数据或令人困惑的细节的困扰,他们读到的议会辩论总是生动的,历史人物也始终个性鲜明、饶有趣味,最后的结果就是,公众认为历史和小说没有任何区别,历史被剥夺了与科学的一切联系,完全成为纯文学(belles lettres)的一个分支^[3]。西利把麦考莱和卡莱尔等人视为导致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

西利把麦考莱和卡莱尔描述为“江湖骗子”^[4],指责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历史真相,而是“致力于创造一种效果,以便让读者感到有趣和兴奋”,并且不无讽刺地宣称“这两个人总有一天会被人们记住,因为他们代表了英国人思想上一种异乎寻常的失常,代表了对历史本质异乎寻常的一种误解”^[5]¹⁷²。麦考莱及其所代表的辉格史观所体现的,乃是一种可以回溯到浪漫主义时期的业余性,当时人们正在反对18世纪历史学家那种冰冷的、目空一切的风格。然而,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历史写作的规范 and 标准开始出现变化,这种历史观显然不合时宜了。

(三) 历史是一门科学

西利承认,历史最初可能是为了满足大众的渴求,并使伟大的事迹长存,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定,这是历史的唯一或主要目的。西利认识到,事实上,这种古老的、半诗意的历史类型早就发生了演变,一种在目的和风格上迥然有别的历史正在取而代之。西利明确表示,新的历史类型是“科学的而不是诗意的……它的目的不在于提供愉悦或赋予声望,而是阐明人类事务的进程。它收集事实,小心求证,以便从中得出结论。……随着事实的积累,科学方法的运用变得越来越容易,把有用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科学的前景就出现了,历史哲学、历史科学等术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3]。在麦考莱那里,历史类似于浪漫小说或民谣,而新兴的、科学的历史观将把历史变成专门的、科学的论文。

因此,在西利看来,真正的或合格的历史研究者不能满足于事实收集者的身份,甚至不能满足于证实事实,更不能满足于以生动的方式来叙述它们,而应当把自己想象成一门伟大科学的探索者,要筛选事实并予以整理,以便找出其中的规律。当然,西利敦促历史研究者放弃文学的方法,并非要让其下降到勤勉而沉闷的编年史家层次,而是希望他攀登到更高处,做一个发现者而不是艺术家,而是要像科学家那样,运用想象力,构建那些联结事实并使之生动活泼的概念^[2]。

按照西利的看法,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在于关联、分析、解释尤其探究过去的记录,以寻找可识别的因果模式,“在历史上,一切都取决于把叙述变成问题。只要你认为历史仅仅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叙述,你就会陷入旧有的文学窠臼之中,得不到值得信赖的知识,只会产生所有严肃的人都会厌倦的浮夸老套的浪漫故事。打破让人昏昏欲睡的魔咒;向自己提问;给自己设定难题;你的头脑立刻会有一种新的态度;你将成为一名研究者;你不再庄严,而是开始变得严肃。”^[6]¹⁷⁴⁻¹⁷⁵由此可见,历史并非无关紧要的或文人的消遣,它应当被视为一门科学。

西利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像科学或政治一样严肃的学问,它值得最认真的人花时间研究,也值得用最精确的方法予以研究。在1881年一次演讲中,西利宣称:“目前,历史领地的很大部分几乎无人开垦,而要对其开展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对历史之功能的可悲而幼稚的误解普遍存在,因为人们把历史看作一种娱乐或文学表演;这种误解妨碍了这项研究得到适当的组织,反过来,组织的缺乏又使这种误解得以持续。”^[7]历史是一门科学,与纯粹的文学不一样,“科学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组织”,文学只需要作家和读者群体,而科学(一切严肃的研究)需要的是一群高贵的学者,他们可能介于作家和大众之间。纯粹的文学领域就像一种民主制度,而诗人类似于政治家,寻求一种平民立法(plebiscitum),如果没有大量选票,他就寸步难行。科学则不一样,“公众对牛顿或法拉第的看法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这样的人,公众必须按照他们被告知的那样去想。这些人的发现是否受欢迎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公众不喜欢他们的学说,那只能说公众必须学着去喜欢!”^[7]西利声称,在科学领域,投票权限于那些把真理视为严肃的事情并且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探究它的人,虽然这个探求真理的特别陪审团也会出错,但是不可替代。

对于英国实证主义史学家巴克爾(H. T. Buckle)在宣扬科学的历史观方面作出的贡献,西利也表达了适当的认可。他指出,在英国,“巴克爾先生是第一个成功地使这种历史观深入人心的作家,我同意他关于历史与一般规律有关的看法”^[3]。不过,巴克爾宣扬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科学,主张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研究,这显然不符合西利等人推崇的德国学派的历史观。西利也指出了自己与巴克爾的差异。首先,巴克爾的史学名著《英国文明史》主要是在大众而不是学生那里取得了更大成功,“它得到大量讨论,向大众开启了一种新的观点。但是它或许对思辨过程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它现在不常被提及”;其次,巴克爾的这本书很少讨论政治问题,而西利认为,“历史很大程度上一直与国家及其兴起、发展和组织有关,因此可以预期,历史科学将主要关注国家”^[3]。

综上所述,西利在历史和文学之间做了区分,强调历史研究必须是严谨科学的,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因果规律,阐明人类事务的进程。他也指出,历史本质上与政治有关,历史是关于国家的科学。西利对历史学本质的思考,促进了19世纪英国历史学科的职业化发展。

二、西利对历史与政治之关系的阐释

西利在其众多的演讲和作品中,大力强调历史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说,西利不但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事实上,西利在担任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讲座教授期间,不但极大地促进了英国历史学科的专业化,也推动了英国政治学科的发展。

(一) 历史是政治科学的基础

在谈到历史的实用性和重要性时,西利声称:“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称之为政治的事物,以及对众多人口产生影响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取决于它。”^[2]西利认为,历史不但是政治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政治结构的基础。他假定了两两者之间直接的联系:“政治和历史只是同一门研究的不同方面。存在一种庸俗的政治观点,它认为政治仅仅是各种利益和党派之间的斗争;也存在一种浮华的史学,只以文学性展示为目的,生产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令人愉悦的书籍。在我看来,这些反常现象来自对属于彼此的两个主题的不自然划分。”^[8]西利进而宣称:“如果政治没有得到历史的拓展,那么它难免流于庸俗,而如果历史忽略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便蜕变为纯粹的文学。”^{[8]93-94}西利还认为,“讲授政治科学也就是在讲授历史”,政治科学“并非与历史截然有别的事物,而是与它密不可分……我敢说,缺乏政治科学的历史只是一种不完美的、被削减的研究,而缺乏历史的政治科学是空洞的、毫无根据的——换言之,脱离了政治科学的历史结不出硕果;脱离了历史的政治科学缺乏根基”^{[9]3-4}。

西利察觉到,与以往相比,当时的人们强烈感受到了政治领域对一般原则的需求,这些原则被认为是在启蒙的渐进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并形成了公认的文明体系。那么,这些原则又是从何而来呢?在西利看来,它们唯一可靠的基础,乃是一门关于国家的科学,而这种科学坚实地建立在对事实的伟大归纳之上。当我们寻找这种普遍原则时,以往的历史显然无法担此重任,因为它只是一种叙述,很少宣称要建立这种原则^[2]。这就需要一种新型的历史,它尤其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西利十分强调政治观点的历史依据。他否定人们可以通过先验的方法得出政治原则,认为只有通过对国家的观察和比较,人们才有希望了解政治原则。但是,令西利深感震惊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英国人似乎并没有承认政治与历史之间的联系,一半以上的政治教师采用了这样或那样的先验方法。在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指出,要想获得令人满意的知识,尤其要对政治必须基于其上的历史——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历史——进行严谨的分析和批判^[7]。

(二) 历史是一门关于国家的科学

很明显,对西利而言,历史不是宗教的历史或艺术的历史或社会的历史,而是国家的历史。他宣称:

“历史学家是一位科学人士,就像生理学家那样,他的目标在于发现规律,发现被称为国家这一伟大社会学现象的规律。”^[7]西利强调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相关性,认为历史是与国家的实际存在和发展相关的大量事实,它不但处理过去,也讨论晚近与当下,它根本就不偏爱浪漫的或非凡的事物,只是寻找某些事实,以便人们可以从中得出与国家的生命相关的重要推论^[2]。西利明确指出:“历史并不是宪法,也不是议会的唇枪舌战和伟大人物的生平事迹,更不是道德哲学。它讨论国家,探究它们的兴起、发展、相互影响以及兴衰的原因。”^{[6]151}

由此可见,西利眼中的历史不再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而收集起来的事实,而是一种科学的收集,旨在提供一种基础,以便对国家进行分类和做出分析。西利的学生坦纳指出:“在他看来,国家的一切现象都是历史学家的本分工作,而政治家形成判断的材料,正是从历史学家的工作中获得的。”^[10]英国历史学者费希尔也认为:“国家理念激发了西利笔下的每一个句子。在西利看来,国家不仅是历史的合适的问题,而且也是人类最高贵的思考对象、人类最重要的探索主题。”^[11]

(三)政治家应当学习和掌握历史知识

西利认为,人们所持的政治观点都是以历史为根据的,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会导向一种关于政治真理的体系^[2]。在他看来,“历史不是好古主义,不是传记,也不是诗歌。它是政治家可以从中得出自己的观点和政策的蓝皮书。”^[7]因此之故,西利宣称“历史是培养政治家才能的学校”,历史也是“培养公共情感和爱国主义的学校。如果没有一点历史知识,那么没有人会对政治产生理性的兴趣;如果没有大量历史知识,那么没有人会对政治做出理性的判断”。西利也发现,确实有些不懂历史的人成为风光无限的政治家,不过,西利奉劝他们最好不要涉足政治,而有些对历史略知一二的人却对政治漠不关心,原因在于他们对历史的了解还不够^{[12]298-299}。

西利宣称,对于政治家而言,历史知识是必备的。他以不同的专业人士为例做了如下论述:如同律师不可缺少法律知识、牧师不可缺少神学知识那样,一个政治家不可或缺的东西,无疑是关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知识。西利认为,剑桥大学应当成为培养政治家的学校。他相信,那些聚集在剑桥的学生,正在为自己的人生做准备,因为英国下一个时代的立法者和政治家必定会从这些年轻人中选拔出来。在剑桥,他们将开始形成影响其政治生涯的观点和意见,通过剑桥的诸多影响——各种聚会或俱乐部——他们为政治生活做了准备^{[12]299}。

西利也意识到,他本人的看法,即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知识对政治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会受到质疑,毕竟,深刻的历史学家也很容易沦为肤浅的政客,而来自遥远时代或者完全不同国家的经验,难以促进对当代事务的理解,古希腊或古罗马经验也不适用于当下备受争议的政治问题。西利也预设了人们如下反对立场: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不是轻视各种学问吗,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科布登(Cobden)不是一直在嘲笑那些只知道探究过去事务的学究吗^{[12]301}? 这些难道不足以证明历史对政治毫无用处吗?很显然,西利断然不会同意这种推论。

西利指出,这种观点预先假定历史仅仅指遥远的过去,而“‘历史’一词获得这种意义是很自然的。通常而言,我们往往就是这么使用历史这个词的。我们说,当一件事情过去了,它就属于历史”。历史的名号被赋予那些叙述过去——大多数情况下是遥远的过去——发生之事的书籍,不会提供给对现存的制度或社会做出的简单叙述。不过,西利也表明,有许多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属于历史,而有许多现在的现象却属于历史。他还声称,在科学上,现象是根据种类的相似性而不是根据日期来分类。历史必定只是科学地处理某一类事件和现象,这类现象属于历史,不管它发生在什么时期。政治制度无疑属于历史范畴,研究政治制度的人,也在研究历史。因此,西利认为,因为一位政治家无视遥远的过去而断定他无视历史,实在是一种误解^{[12]302-303}。

(四)现代史应当受到重视

西利不满英国历史研究的现状,因为这种研究或历史写作主要关注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忽视当代

问题与现代欧洲大陆的历史,“我们不写现代法国、德国或俄国的详尽历史,我们也不认为应该写这样的历史作品”^[13],这显然不利于国家未来领导人的培养。西利认为,现代史特别契合当下的政治问题,因此,他的讲座也偏爱现代时期,关注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作为欧洲体系成员的不列颠的历史。1881年,西利在伯明翰历史学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也提倡现代史研究,批评一种狭隘立场,即认为古老而久远的时期才与历史学家相关,因而应当疏远一切当前的、现代的和活生生的事物。如果那么做,历史学家就会变成纯粹的古物收集者。西利强调,“过去属于历史,晚近、现在以及未来也属于历史”^[7]。

西利指出,在历史研究中忽视晚近时期的一个结果,就是英国人完全误解和低估历史的用途。人们往往把历史看作一种愉快的、不受拘束的追求,尤其对年轻人有益,因为它能激发想象力,也能够在他们面前展示伟大的榜样,“当我们谈到历史时,我们总是想到古雅典、古罗马或中世纪;如果我们思考英格兰的历史,那是斯图亚特王朝、都铎王朝或金雀花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7]不过,如果把近代历史放置在合适位置,同时认为它会通向一种关于国家科学的话,人们持有的历史之用途的整个看法就会发生改变。由此观之,“历史所处理的问题显然与政治的完全一样,它无非就是政治的理论方面,它既是对政治家的研究,也是培养政治家的学校。”^[7]

综上所述,西利对历史研究的对象以及历史学的实用性目标的认识,促使他在历史与政治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因此,有学者把西利视为一名政治史家,因为他所属的历史作家群体,几乎完全把政治事件放在他们所研究的人类一切基本活动的核心位置^{[14]85}。

三、西利与英帝国史书写

由上述可知,西利宣称历史是国家科学,主张历史研究应当探讨国家,包括它们的本质、起源和发展等。他本人对英国扩张的关注和讨论,无疑是这种历史认识论的体现。通过考察英帝国及其制度建设问题,西利不但在历史研究中突出了现代史的地位,拓宽了研究范围,同时也为当时英国政治家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政治智慧。

(一) 英帝国研究与《英格兰的扩张》

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关于英帝国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既反映了其时英国民众的帝国主义情绪,也进一步刺激了这种情绪的高涨。一些政治家、文学人士和专业历史学家着手探究殖民地的价值、帝国关系的本质以及英帝国的未来等问题。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的《更大的不列颠》(1868)和《更大的不列颠的问题》(1890)、弗劳德(J. A. Froude)的《大洋之国或英格兰及其殖民地》(1886)和《西印度群岛的英格兰人》(1888)等著作,采取了流行的游记形式,在个人反思中调查了英国殖民地的状况和面临的问题。除了这些描述性作品,也有学者开始在明显的历史语境下探究英帝国的扩张以及帝国关系不断变化的本质。西利是这方面研究的先驱者,其代表作是1883年出版的《英格兰的扩张》。

西利对帝国和联邦问题的讨论,可以回溯到他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罗马帝国以及欧洲合众国的文章,1887年,他又发表《乔治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扩张》一文。由此可见,西利的“英帝国史书写深嵌于一贯的思想脉络中”^[15]。《英格兰的扩张》由西利在剑桥讲授的两门课程的讲稿构成,第一部分讨论白人殖民地问题,第二部分处理印度问题。该作品在出版之后引起广泛关注,赞誉多于批评之声。西利的早期研究者赖因在其著作《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爵士研究》中声称,“《英格兰的扩张》既是一项历史研究,又是一项政治纲领”^{[14]71,80}。英国历史学家古奇也把《英格兰的扩张》称为相关研究者的“《圣经》”^{[16]593}。还有研究者指出,较之于史学史研究,这本著作的出现对于那个时代的政

治史来说也许更重要,事实上,许多人甚至把所谓“新帝国主义”的研究从它的出版开始算起^[17]。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英格兰的扩张》是帝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18]。

《英格兰的扩张》一方面反映了英国国内对殖民地和帝国不断高涨的兴趣,另一方面也是对英国当时普遍存在的“狭隘”眼界的批评。按照西利的说法,英国在不经意间征服了半个世界,然而,从思想上来看,英国人仍然认为自己不过是欧洲大陆北海岸的一个岛国,这种心态也对历史学家产生影响,导致他们过于注重议会纠纷和关于自由的讨论,未能意识到英国的历史已经更多地出现在美洲和亚洲的事实。虽然西利也承认英国晚近历史中的民主趋势,但是他指出,这种现象也只是在18世纪才开始初露端倪,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并且从更加全面的视角来观察英国,那么,“过去几个世纪英国更巨大,也更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英国的名字在全球的扩张,这是更大的不列颠的基础”^{[6]8-9}。很显然,西利的历史视野超出了辉格史观,他把关注的中心从国内政治改革转向帝国扩张。事实上,他在《英格兰的扩张》中对英帝国演进所做的考察,也符合他对历史的一贯界定,即历史旨在探究国家的发展及其规律。

(二) 西利与“更大的不列颠”概念

西利的“更大的不列颠”概念借自迪尔克,它是指不列颠本土居民及其移民海外的英国人组成的集合体。在《英格兰的扩张》中,西利声称,“当我们考察事物当前状态时,尤其在展望未来时,应当注意不要只把英格兰推到前台,而让我们所谓的英国属地消失在后台”,接着,他从两方面讨论了不列颠的发展,其一是三个王国的联合,其二是英国对外的扩张^{[6]9-10}。对外扩张是“更大的不列颠”得以形成的基础,而一个小英格兰,一个失去了帝国的英格兰,对西利来说不仅意味着国家的堕落,而且也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因此,不难理解,西利成为联邦的温和支持者,不过,他支持的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形式的联邦,而只是联邦理念。西利在晚年的一系列演讲中,怀揣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即培养英国人对帝国的热情,让人们相信它是值得维系的,并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保存现有的联合。

西利在讨论“更大的不列颠”时,显然没有把印度纳入其中。“更大的不列颠”包括联合王国和其他四大块土地,即加拿大自治领、西印度群岛(包括中南美洲一些土地)、南非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7世纪以来,随着英国在海外的殖民扩张,英国人也开始向外不断移民,由此扩大了英国民族分布的范围。共同的种族、宗教信仰和利益使得英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过去帝国不具备的稳定性和同质性。正因为如此,西利很乐意把这个帝国称为“更大的不列颠”。而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塑造的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因为对印度的征服是凭借武力完成的,另外,印度在种族和信仰上也与英国有着天壤之别,故印度无法成为“更大的不列颠”的组成部分^{[6]10-11}。

西利认为英帝国(不包含印度)适合采用联邦制。由于“更大的不列颠”是英国民族在地理空间上的一种延展,白人在定居的殖民地上推行的语言和行为方式与不列颠在民族、语言、宗教上是一致的,因此,西利认为英帝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完全可以通过联邦制把各部分结合在一起,这样,不但可以避免罗马帝国那种专制主义,也能够保证帝国各部分的自治权 and 个人的自由。西利的这种思考,也是以独立后的美国作为样板。美国的经验表明,联邦制组织形式可以治理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同时能够保障个人自由,而且“更大的不列颠”在种族、信仰和制度上与美国存在高度相似性,因此,“更大的不列颠”能够成功地转变为一个“联邦制”国家^[19]。不过,与大多数提倡联邦制的人不同,西利并不关心为帝国议会或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的代表制定精确的计划。加拿大历史学者彼得·伯勒斯(Peter Burroughs)指出,西利提出的“更大的不列颠”是一个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统一体,它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概念,是把分散的英国民族团结起来的集体意识和道德意志的表达,而理想主义者没有责任设计宪制或行政机制,以便把理想转化为实际的政治,也没有责任提出未来联邦可能采取的具体政策^[20]。尽管如此,西利关于英帝国的论述还是对实际政治产生了影响,英国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和罗斯

伯里伯爵(Earl of Rosebery)受到西利观点的影响,成为“帝国联邦”的支持者^[21]。

(三) 英国历史学家捍卫西利的帝国观

根据古奇的说法,西利《英格兰的扩张》一书的精神,“决非对帝国本身或帝国所由建成的方法的过度狂热……他并不认为帝国版图的庞大足以证明我们民族的不可战胜的英雄主义或者它的异乎寻常的统治天才。此书所引起的是思考而不是得意”^{[16]593}。英国历史学家欧文·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认为,《英格兰的扩张》不是种族主义的,也不是沙文主义的,因为西利从来没有说过帝国主义就是把文明带给落后的民族,他也无意进一步扩张帝国^[4]。不过,西利反对爱尔兰自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他对英国现代史上帝国主题以及英国民族在世界历史上之地位的讨论,鼓励了英国人更强烈的自我意识。在西利的影响下,历史的力量被用来解释和证明政治现实和对未来的预测,由此,西利促进了历史和情感之间的结合。

四、结 语

19世纪中后期,在德国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激励和启发之下,英国的历史学逐渐转型,以西利、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等人为代表的剑桥和牛津历史学家,致力于历史学的专业化工作,极大地推进了英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就西利而言,他反思了英国历史研究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在一系列作品中批评浪漫主义史学的浮夸甚至谬误,倡导历史学的科学属性,并且还在创建英国历史学会和专业期刊《英国历史评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利的史学思想和实践,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西利相信,历史不但需要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它也应追求一种实用的目标。这种实用性尤其表现在历史的教育功能上。西利强调历史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因此,他眼中的历史教育也是一种政治教育,目的是培养未来的政治家。西利帮助建立起来的剑桥大学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制度(The Historical Tripos)也偏重政治学习,他强调这所大学是培养政治家的学校。可见,西利把历史教育当作一种公民教育,同时也视之为培养国家意识和造就政治精英的工具^[22]。西利对英格兰扩张的讨论,既是在考察英国国家的发展,也是在回应人们对帝国主题的关注,由此他不但成功地引起了人们对现代史和当代问题的兴趣,也拓宽了英国历史研究的领域。

当然,西利的史学思想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西利把历史界定为一门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国家科学,过于强调历史与政治的联系,忽视历史的其他维度,比如巴克尔着手进行的文化史书写,这无疑体现了其历史认识的狭隘性。其次,西利强调历史研究的严谨和科学性,但是他本人的大多数作品都没有使用注脚甚至缺少参考文献,读者不知道他在何处使用了何种原始资料,这显然有损他的“科学的”历史学家形象。此外,西利认为,历史研究要有助于理解当下与预测未来,这就使得其讨论带有某种目的论,难免以筛选过的事件来证明预想的计划和结论。

[参 考 文 献]

- [1] Ian Hesketh.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 Victorian Britain: Making the Past Speak [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6.
- [2] Seeley J R. On History Again [J]. Macmillan's Magazine, 1882(277): 67-80.
- [3] Seeley J R. History and Politics I [J]. Macmillan's Magazine, 1879(238): 289-299.
- [4] Owen Chadwick. Historian of Empire [J]. Modern Asian Studies, 1981(04): 877-880.
- [5] John Kenyon. The History Me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England since the Renaissance [M].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83.

- [6] Seeley J R.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83.
- [7] Seeley J R. A History Society [J]. Macmillan's Magazine, 1881(265): 43-55.
- [8] Deborah Wormell. Sir John Seeley and the Uses of Hist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9] Seeley J R.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Two Series of Lectures [M]. London: Macmillan, 1896.
- [10] Tanner J R. John Robert Seeley [J].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895(39): 507-514.
- [11] Herbert A L. Fisher. Sir John Seeley [J]. Fortnightly Review, 1896(356):183-198.
- [12] Seeley J R. The Teaching of Politics [M]// J. R. Seeley. Lectures and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1870.
- [13] Seeley J R. History and Politics II [J]. Macmillan's Magazine, 1879, 40(239):369-378.
- [14] Gustav Adolf Rein. Sir John Robert Seeley: A Study of the Historian [M]. Wolfeboro: Longwood Academic, 1987.
- [15] 施华辉, 周巩固. 书写帝国: 西利、卢卡斯、艾格顿与英帝国史 [J]. 史学史研究, 2017(02):89-100.
- [16] 乔治·皮博迪·古奇.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M]. 耿淡如,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 [17] Wesley Frank Craven.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British Empire [J].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34 (01):40-69.
- [18] 张志云, 沈高阳. 英帝国史的起源、发展与近代中国的互动 [J]. 史林, 2023(03):40-53.
- [19] 吴征宇, 陈小屋. 历史与政治: 约翰·西利与《英格兰的扩张》[J]. 教学与研究, 2023(05): 117-128.
- [20] Peter Burroughs. John Robert Seeley and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J].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1973 (02):191-211.
- [21] 施华辉. 约翰·西利、爱德华·弗里曼的古今比较及其帝国观念 [J]. 世界历史, 2022(01):11-27.
- [22] 施华辉, 周巩固: 历史怎么教、教什么: 西利与剑桥大学历史学专业化的早期历史 [J]. 历史教学问题, 2017(05): 177-185.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History: a Study on John Robert Seeley's Historical Thought

Liu Yaohui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al Work,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John Robert Seeley was one of famous British historian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 vital advocate and promoter of the specialization of history in Britain. Seeley opposed the literary history represented by T. B. Macaulay and advocated scientific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he believed i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politics, stressing that the study of history was the study of politics, claiming that history was a science about states and history was a school for statesmanship. Seeley expressed a strong realistic concern in his works, his exploration of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was also a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faced by British Empire, an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British imperial sentiment and later researches concerning empire.

Keywords: John Robert Seeley; scientific history; T. B. Macaulay; statesmanship; British Empire

[责任编辑:刘力]